

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

蒋凡等著

王闿运与王先谦治学特点比较
章太炎与刘师培学术道路比较
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
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
杨树达与于省吾治学方法比较
陈寅恪与郭沫若治学特色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
郭绍虞和朱东润治学特点及方法比较
钱穆与冯友兰治学方法比较
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游国恩与姜亮夫《楚辞》研究比较
陆侃如与冯阮君治学方法比较

出版社

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

蒋凡等著

山东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蒋凡等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0713-583-8

I. 近… II. 蒋… III. 治学方法—对比研究
IV. 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7845 号

责任编辑 苏海坡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60×228 毫米

17.5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史类

序

蒋 凡

2006年6月下旬，最后由我撰写的《章太炎与刘师培学术道路比较》一文画上了句号。这样，我主编的《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一书共12篇论文，终于先后告竣而杀青定编。在炎热酷暑的37度高温熏蒸下，书稿最后定型，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让人长舒了一口气。

在时下商品经济大潮中，编撰此类学术著作，吃力而不讨好，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学术是什么？能赚钱，购汽车，买洋房，还是能让人随心地吃香喝辣？当然都不能。目前出版行业并不景气，娱人眼目的文艺书籍尚且愁嫁，更何况是严肃的纯学术著作呢？学术者，如刘师培《国学发微》所说：“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言之用。”学术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生产，是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的共处和斗争中的理性思考和智慧总结，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岂可因其缺乏物质商品的诱惑就弃如敝屣呢？人类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二大部分。在物质方面的衣食温饱有了基本保证以后，精神需求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作为一个人，食不果腹不行，精神空虚也不行，二者缺一不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超越于动物的地方。学术是有意义的事情；追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貌似无用，实际却是无用之用，合于庄子所说的至道之大用。如章太炎《与王鹤鸣》信中所说：“仆谓学者将以实事实求

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其所谓“致用”与“无用”，有现实的针对性。“致用”指世俗借学术以干利禄而拾青紫，假学术以取宝贵；“无用”则是提倡学术的纯洁性，重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一说法合乎庄子所称“大用无用”，是深刻揭示学术本质的最高精神境界。于此可见，对于学术著作，千万不可短视，不能只求其真接的现实功利，而应眼光放大、放远，关注激活人类精神生命的不朽之盛事。

本书编撰，缘起于大学教育的需要。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研究生制度刚恢复不久，研究生教学常是运用师生切磋而教学相长之法。学生不仅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进一步还要求结合现实发展而明其所当然。其所期待甚高。但因“文革”期间的耽搁，面对各种学术科目及众多书籍，人们却茫然而不知从何处入手。恰巧，那个 80 年代和“五四”时期一样，为了学术创新的需要，重新掀起了一股探讨方法论的学术热潮。这对我们是很好的启发。比如胡适的传统学术功底及学问造诣，不仅比不上章太炎、王国维，就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相较，也有所不及，但他却以半部《中国哲学史纲》、若干考察之作以及《白话文学史》等，俨然成了当时的学界泰斗，学术地位堪与章、王、康、梁比肩而毫不逊色，这是为什么？艾思奇在《二十年前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解释胡适成为学界“天之骄子”的原因，说：“与其说胡适对于新文化有何创见，不如说他的功绩仅仅在新方法方面的提出。”所论虽然不够全面，但操斧伐柯，取则不远。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探索的确非常重要。胡适曾经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名言，作为治学的金科玉律，并以之金针度人。这是受到当时西方实验主义哲学影响。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

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特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足见胡适对于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何等的重视。所谓“方法”，从拉丁文的语源学来考察，指的是遵循一定方向、道路的意思，也就是指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意思。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明确指出了学术方法与道路的重要性：“正如俗话说，一个能保持正确道路的瘸子，总会把跑错了路的善跑的人赶过去。不但如此，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跑错了路的话，那么愈是活动，愈是跑得快，就愈会迷失得厉害。”（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比喻非常生动形象，见解精当。是否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关系重大。方法先进，事半功倍；方向错误，则将南辕北辙，迷途不返。受其启悟，我就结合平素所学，给研究生开设了“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研究”专题课。本书就是教学进程中师生交流对话的学术结晶，并期望以此来与广大读者共勉。

在编写过程中，困难之大，难以想象。比如写章太炎与刘师培学术道路比较研究，光是《章太炎全集》八大册、《刘申叔遗书》巨著，其内容几乎包括了经史子集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了声光化电及医道，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历史，兼容并包，广博精深，几乎无所措手足。但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与松懈。就这样，两年多来，细读了章、刘二家大著，慢慢克服文字难关，突破知识障碍，终于读出点兴趣来，而略有所悟，并期望能有机会和大家一道进行深入讨论。

为什么我们不是进行个案剖释，而是采用二人比较的研究方式呢？因为比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可以把学风相似而成就相当或学术个性强烈而各异其趣的大师，置于同一时代思潮与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考察；通过比较，更能见出二人学术之异同与优劣。学术方法的异中之同及同中之异，非细加比较则难以明了。学生们通过治

学方法之比较，从中广泛汲取经验、教训，借鉴一切有益的东西，根据自己的学术实践，重新加以改造和变化，以便形成对于自己更加有用、更加科学、更加合乎实际的治学方法，从而促进自己学术的健康成长。

本书的研究对象，合乎传统大文化的说法，是文史哲全方位的展开，包括了语言与文学领域。论文的先后排列，以研究对象的生年为序。其中囊括了 23 位大师，无一不是时代的翘楚或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各有自己的重大贡献，以资后人借鉴。论文 12 篇，署名发表，以示文责自负。论文共有 12 位作者，除主编外，都是昔日和我一道切磋学问的博士。他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在学术道路上各有著作和贡献。当然，由于本书的总体构思、创意及篇目设计由我提出，文章曾经讨论并经我阅读全书而加以统一和润饰，不足之处，由主编负责，并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书出版，得到山东画版出版社苏海坡先生鼎力相助，特致衷心谢忱。

2006 年 6 月 21 日夜

于海上半万斋

目 录

序	蒋 凡 /1
一、王闾运与王先谦治学特点比较	谭 雯 /1
二、章太炎与刘师培学术道路比较	蒋 凡 /20
三、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	吕玉华 /46
四、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	白振奎 /59
五、杨树达与于省吾治学方法比较	丁 进 /78
六、陈寅恪与郭沫若治学特色比较	赵彩花 /94
七、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	刁生虎 /132
八、郭绍虞与朱东润治学特点及方法比较	王启才 /201
九、钱穆与冯友兰治学方法比较	
——旧学与新知	黄 鸣 /216
一〇、闻一多与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章 原 /233
一一、游国恩与姜亮夫《楚辞》研究比较	曹建国 /243
一二、陆侃如与冯沅君治学方法比较	
——相知相伴伉俪情笃 志同道合比肩并进	温秀珍 /258

一、王闾运与王先谦治学特点比较

谭 雯

王闾运与王先谦均是湖湘学派的一代国学宗师。近代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叶德辉曾在王先谦的《葵园四种》书跋中提到：“公昔在湘，与湘绮先生有二王之目……”可见，当年二位先生的学术文章在湖南学界颇负盛名，且以“二王”齐名于世。王闾运生于1833年，卒于1916年；王先谦生于1842年，卒于1917年。二人一生均与中国近代社会相始终，共同经历了政治文化的风雨巨变。因此，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時代文化背景。王闾运是湖南湘潭人，王先谦是湖南长沙人，二者都是在湖湘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的熏陶。因此，二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取舍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天赋禀性、人生际遇的差异又使他们在学术文苑中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本文拟从他们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的学术入手，兼及二者教学过程中的点滴治学经验，比较二者治学特点的异同，并总结其优劣，以期扬长避短，有助于我们当今的国学研究。

王闾运，字壬秋，因其室名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他咸丰七年（1857年）中举，曾经在曾国藩的军中盘桓过一段日子，但没有受到重用，只好辗转神州南北，寻求经世之机，却始终未能施展其报国宏愿。光绪四年（1878年），他开始在湘、蜀两地教书育人，历主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年近八十岁的王闿运被授翰林院检讨,后特加翰林院侍讲。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声望,曾聘他任国史馆馆长。王先谦,字益吾,人称葵园先生。他同治四年中进士,从而跻身翰林,擢中允,连岁数迁,官至国子监祭酒。与湘绮相比,葵园先生的仕途称得上荣达显耀了。但他也未满五十就致仕还家了。此后十余年间,他先后在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等长沙各大书院传道授业。他们二人在晚年都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同时也让他们有机会将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总结归纳,泽及后人。

(一) 评经注典中治学特点之异同

他们的研究成果均遍及经、史、子、集四门,然而各自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的具体对象和角度又可谓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在经学方面,他们都有大量的著述。王闿运有《周易说》、《尚书笺》、《诗经补笺》、《周官笺》、《仪礼笺》、《春秋公羊笺》、《谷梁申义》、《尚书大传补注》、《论语训》、《尔雅集解》,几乎是遍注群经;而王先谦在这方面也颇有成就,如《皇清经解续编》、《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都是极具价值的经学著作。

《湘绮楼诗文集·王志·论为学当治经》中有一段论述曰:“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以经典博奥,子、史简浅故也。儒者乃以博通子、史相夸,则视为词藻,无关学矣。诸子各有所偏,庄子《天下篇》论之亦详。其未及管、商、申、韩者,尤与学术远也。……史论成败,尤无所益。望其得失,乃是机权。事后论事,何关损益?今之读史,但知体例耳,乃是作文之一端,亦无关学。学能通经,自知文体。”特别强调了读经在做学问中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学问的基石和唯一的正道。尽管言语中对子、史的贬斥过于偏激,但足见其持论坚决。《清代七百名人传》虽然将他归为《文学

卷》中，但也论及其治经特色，称：“其学盖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所谓今文家之学也。”尽管王闿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贡献远不及其文学史上的声名显著，但是他所遵循的一套治经方法仍然颇有特色。因此，《清史稿》将他列入《儒林传》，称其“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对他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表示肯定。另外，该书还称引湘绮的两段原话，曰：

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

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

可见他治经学，仍然从文字训诂入手，重视典章规度，却并不执著于文字的考证，而是寻求这些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期有补于世。正如他自称：“余笺注八经，皆切时用。”^①可以说，他的治学方法初衷是希望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所长，而读出自己的胸臆。尽管何耿镛在《经学概说》中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评价王闿运经学造诣并不深，但王闿运在文坛上称雄一方，其深厚的经学功底想必是曾助他一臂之力的。

王先谦则与湘绮不同，同样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他被归为《理学卷》，评曰：“辑刊《续皇清经解》，凡二百十种，一千四百三十卷。虽不如文达之精萃，而有清一代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治经循乾嘉遗轨，重考证，而小学颇疏，惟《尚书孔传参正》辨析详确，

比他书为醇”。而他的《诗三家义集疏》更是得到了诗经学家们的广泛认同。程俊英教授赞曰：“从材料的完整来看，可说是搜罗殆尽，蔚为大观。”（《〈诗经〉研究史鸟瞰》）；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也谈道：“自王氏《集疏》刊印之后，类似著作已不再继有，因而《集疏》可以确认为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葵园在经学方面的著述数量不及湘绮，但评价似乎在湘绮之上。究其原因，我认为葵园之功在于给后学者的研究道路作出了有效的铺垫。

葵园的《续皇清经解》收录了千余卷文献。且不说收集、校勘如此之多的资料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就是出版这样卷帙浩繁的书籍，也是他四处募集、花费大量的精力才得以实现的；而使后学者在研究中能轻松地获得丰富的文献资料、可靠的版本书籍，为新成果的出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为世人所敬重。《诗三家义集疏》也是如此，他在序言中谈道：“近二百年来，儒硕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观，顾散而无纪，学者病焉。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通贯。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毛、郑二注，仍列经下，俾读者无所缺望焉。”^②可见，他对古籍搜罗整理，梳理贯通，全为还经学以本来面目而很少阐发自己胸臆。

湘绮的笺注则不同。他以阐述自己的见解为主，虽然在《公羊》学方面对廖平、康有为的学说有所启发，但他毕竟没能像他们一样完全走出传统，立一番惊世之言。可是，学者读他的书可以受到启发，引发灵感，在传统中获得点滴的进步，也是客观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湘绮自己乐在其中，受益匪浅，读出了新意，读出了自己。

他们二人在历史地理、诸子等方面也着力颇勤。王闿运有《湘军志》、《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州志》、《东安县志》、《庄子注》、《墨子注》等；王先谦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水经注》、《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图志》、《外国通鉴》、

《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等。

近代社会，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史学界也卷入了这场洪流。“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期，史学方法出现多种多样情况。一些学者继续运用和发展乾嘉的考据法，整理史料和史籍。如王先谦编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超越考据学的局限，撰述史学著作。但同是史学著作，有的试图继承孔子《春秋》以及正史的体例和义法，编著史书，以表述个人的政治伦理观点。如王闿运的《湘军志》……”^③足见当时二王在史学领域都有所建树，但他们走的学术道路并不相同。

王先谦使用的是乾嘉史家的方法，其目的只在求得历史的真实，而反对对历史的真实性再作发挥引申。因此，他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书都是经过反复积年的考订，到处搜罗注本，广取各家各派的意见，汇集成章，为后来人提供方便；即使是偶尔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也是在维护正统史学的前提下对旧史的体例、方法进行谨慎的阐发。他一贯秉承的就是扎实稳重的治学风格。从他在《合校水经注》序中的一段话就可见一斑。其言曰：

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绘图，参列今地，兼思补正各史关涉水地事迹及经注未备各水，为之作疏。^④

为校注一本书花费三十年的光阴，其恒心和毅力已非常人可比，加之每作一项注解，都要亲临实地进行考证，称其一丝不苟绝非过誉之辞。

而湘绮先生的治史方法与葵园几乎大相径庭。首先，湘绮着力于写史，属于“作”而非“述”。其次，湘绮充分利用了自己创作可以有较大的发挥余地这一有利条件，用自己丰沛的激情铸就了一部文笔

优美而又犀利的《湘军志》。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于书中对湘军某些将领如曾国荃辈颇有非议，招致当事人不满，而导致《湘军志》问世一年，刻版就被销毁以平息众怒。此书一出即毁誉参半。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却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无论是赞誉还是指责，《湘军志》的史学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它是那个时代新史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太平天国与湘军交战前后的史实。其余《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州志》、《东安县志》等著述，虽然影响不大，但其叙述翔实，文笔雅炼，也有可观之处。总之，湘绮治史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总不忘加入自己的主观见解，摆明立场，抒发激情。与蔡园谨小慎微地对前人史学著作整理补充很不相同。

关于诸子学的研究，二人呈现的不同风格与史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相类似。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蔡园的《荀子集解》和湘绮的《墨子注》分别有所评价，认为前者对“自杨倞至清儒诸家说网罗无遗，而间下己意，亦多善解”；对后者得出的结论则是“壬秋颇有小慧而学无本原，学问已成的人，读他的书有时可以助理解，初学则以不读为妙”。可见二王为学，一以继承旧说为主，一以发明己见为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王先谦在子、史研究中呈现较为保守的风格，但是他对国外的地理、历史的关注却表现出在那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一位学术大师的开阔眼界。他先后撰写的《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图志》、《外国通鉴》就是明证。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上，但是他并非对时事漠不关心，一味地循古守旧。他尝试着将眼光投向世界，并且希望从其他国家迅速富

强的经验中寻找振兴中华之路。在《日本源流考》序中，他谈到日本“捐弃故技，师法泰西。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因此，葵园搜集日本自开国以来至明治维新的历代史传、杂家记载，探寻其维新成功的原因，希望中国能够从中有所借鉴，走向富强。这种尝试的实际收效也许是十分微弱的，但是他那颗思变图强的赤诚之心足以昭然于世了。王闿运同样处于欧风美雨之际，虽专心著述与讲学，但同时仍关心形势，作《陈夷务疏》，意见虽然迂阔，但态度却极其认真。光绪八年（1908年），他曾代川督丁宝桢疏陈遏制英、法、俄国侵略野心之计。时代风雨、中西碰撞对二位学术大师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文学方面，二人均有诗文集存世，但王先谦的创作成就和名气远不及王闿运。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首推王闿运，称之为第一旧头领，并喻之为“托塔天王晁盖”。瞿铎庵《柘庐所闻录》也有“王壬秋闿运以经学文章名坛坫者，历咸、同、光、宣至民国，享名之久，又值变局，盖古今所稀逢”之说。由此足见湘绮在当时诗坛名重一时了。他留下的《湘绮楼诗集》在剔除了所有他不屑的七言近体诗后仍有14卷之多，而岳麓书社在1996年新版《湘绮楼诗文集》中又搜集了集外遗诗四百多首。他的作品还有《湘绮楼词》、《湘绮楼联语》以及论诗著作《湘绮楼说诗》。另外，他还有《八代诗选》、《八代文粹》、《唐诗选》等著述。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地表明了湘绮的诗学主张。

而葵园仍旧是花费大量精力在文献搜集和整理上。他除了编撰《续古文辞类纂》、《国朝十家四六文钞》、《诗馀偶钞》、《骈文类撰》、《诗义标准》等诗词文集以外，还为自己的同辈友人搜集遗作，校编出版。当然，他自己也留下了达15卷之多的《虚受堂诗存》。

湘绮之所以能够以诗文卓然自立于世，在于他能独树一帜，标榜汉魏六朝，并且将之贯彻始终。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讲述了当

时的情形：

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学，海内靡然从风。经学尊乾嘉，诗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戌后起，别树一帜。解经则主简括大义，不务繁征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骈散未分；诗拟六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垒为之一变。

在诗坛上下为宋诗派独占之时，湘绮提出宗尚汉魏六朝之诗，尽管也是复古，却跳出了唐宋之争的圈子，回到了更有情致和生趣的汉魏，就某个层面上而言也是一种创新。一方面，他在《湘绮楼说诗》、《湘绮老人论诗册子》、《王志》等诗学批评著述中为自己的诗学观点构筑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将这一诗学主张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自己的实践创作当中。汪辟疆在其《近代诗派与地域·湘学派》中称赞王闳运的诗作是“辞采巨丽，用意精严，真足上掩鲍谢，下揖阴何，宜其独步一时，尚友千古矣”。再者，从他坚决不把自己的七言近体诗作收入诗集中，也可见湘绮倡言古诗之决心。而他的《八代诗选》、《八代文粹》等诗文选集自然也是其诗学观点的羽翼之作了；后来的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受其沾溉，得以另开一时风气。

与王闳运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不同，王先谦更注重对前人优秀作品的梳理，希望后学者从中得到启发。他编撰的《续古文辞类纂》最具代表性。在自序中，他自称为了继承、发扬姚鼐的散文理论，即义理、考据、辞章为文章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同时推求散文的义法渊源，于是搜集乾隆至咸丰年间古文名家的各类文辞，共39家，455篇，合为34卷，附姚书之后，称为《续古文辞类纂》。王闳运曾评价其“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可见，对葵园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湘绮也是充分肯定的。至于他编撰的诗馀、骈文等集子，也因其取材丰富、判断精严颇受后人称许。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些诗文中，葵园对湖湘文人学者进行了有意的提携，其振兴湖湘文化的热情溢于言表。

（二）教书育人中治学特点之异同

湘绮、葵园二位先生不但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而且还是驰誉湖湘的大教育家。湘绮先生先后执教于四川、湖南、江西等省的多所学院，其学生达数千人。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了文坛雅苑之英才，如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人，可谓都各有所长，卓有成就。湘绮楼诗文中收录了一本称为《王志》的小书，就是王闿运的弟子陈兆奎整理的一部湘绮先生日常与学生交流治学之道的书。书中对学生只言片语的教导，颇能看出湘绮先生培育后辈学人的拳拳之心。因此，陈兆奎在《王志》序中写道：

吾湘王湘绮先生，抗心高尚，恢张绝学，遍注群经，殚发键奥，综百家而一贯，应恒期于五百。晚年缀讲东洲，请业之士负笈云合。有叩斯鸣，无悱不发，博我以文，各得其趣。兆奎从游十有余年，始知六经所以论道，游艺必本于仁，修己乃来物之基，入世有消摇之乐。每于辟席趋隅，偶有所受，即著于篇。信知十之诚难，聊举一以自反。因慕称师之义，而仿郑志之名以署首，俾学者览之，得先生之旨。

从这里一则可见学生对老师的敬仰之情，二来也足见湘绮先生当年声名之盛，引得四面八方的学子云集门下。

而葵园先生同样也可谓是教泽流长。他在朝为官时，曾任江苏学政，颇能慧眼识珠，提拔那些学在正途、根基深厚的有识之士。因此，学部参议缪荃孙在给王先谦七十寿诞的贺辞之中赞曰：“江苏三